

## 近二十多年西周青銅禮器與 金文研究之課題與檢討

許雅惠\*

本文回顧近二十多年來關於西周青銅禮器與金文的研究。英國學者羅森於 1988 年提出西周「禮制革命」一說，近年逐漸受到美國學界的重視，不少研究者也從儀式使用的角度重新檢視傳世與出土材料，強調西周中晚期青銅禮器與金文展演性、公開性的新發展。至於中國學界，1996-2000 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使得金文曆譜與斷代研究成為顯學，然而曆譜研究的方法與基礎，乃至金文性質，都還有不少待釐清之處。2000 年以後，隨著西周大型墓葬與墓地的發掘與公布，出現新的研究角度與課題，如金文與社會網絡、性別課題，老的議題如文化交流，也因為新材料而有突破。本文在整理、評述近二十多年西周銅器研究史的同時，也對研究方法進行分析與檢討。

關鍵詞：禮制革命、禮制改革、夏商周斷代工程、金文曆譜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考古與現代學科方法的引進，使商周青銅禮器從傳統金石學蛻變為現代考古學、歷史學與美術史學。<sup>1</sup>上世紀最富爭議的討論之一是商周青銅禮器上的動物紋樣是否具有意義，長期執教於美國的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1931-2001)認為，商周銅器上的動物花紋表現的是巫師(即薩滿，shaman)的動物助手，幫助巫師溝通天地。許多藝術史學者對張光直的薩滿解釋提出強烈質疑，特別是羅越(Max Loehr, 1903-1988)弟子、繼承形式主義傳統的貝格立(Robert Bagley)。他相信商周動物紋樣並無圖像意義；即便有，由於缺乏直接一手文獻，也已無法追考。這個論爭從 1980 年代延燒到 1990 年代，當中藝術史家與歷史、考古人類學處於對立，他們對張光直的作法，或不留情地批判、或持保留態度。<sup>2</sup>1990 年在大衛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舉辦了一場會議，雙方的辯論見於三年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早期中國青銅禮器之意義問題》(*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sup>3</sup>

從嚴格的美術史圖像學角度來看，張光直的薩滿解釋缺乏直接的文字、文本以為佐證，引用晚期文獻論證商代銅器的作法備受質疑。但對考古人類與歷史學家而言，文獻集結時間雖然較晚，當中體現的信仰結構可能歷經長期傳承，源頭可能追溯到古老過去。缺乏直接文本，不見得就不能談論意義。<sup>4</sup>這個論爭歸根究底是雙方對「文本」

<sup>1</sup> 關於商周青銅容器的研究回顧，參見陳芳妹，〈商周青銅容器研究的課題與方法〉，頁 959-990。

<sup>2</sup> 關於商周動物花紋意義方法的省思與「饕餮紋」的最新研究，參見黃銘崇，〈「饕餮紋」的再思考——一個方法的省思〉，頁 1-102。

<sup>3</sup> Roderick Whitfield 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sup>4</sup> 學者在研究缺乏文字傳統的文化時，仍採用圖像學，但方法上的挑戰也

的基本信念不同，因此在爭辯過後，雙方仍為互不相交的平行線。貝格立近年出版仍繼續形式主義的堅持，分析青銅器風格與技術的關係，並對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與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銅器研究提出尖銳批評。<sup>5</sup>

在激烈的動物母題意義之爭當中，英國藝術史學者羅森(Jessica Rawson)在 1988 年提出西周晚期禮制革命(Ritual Revolution)一說，從「使用」的角度思考西周銅器風格發展，跳脫圖象意義與風格技術之二元討論架構，她的意見逐漸受到西方考古、歷史、藝術史與古文字學者的重視，是西方學界近二十年最具影響力的看法之一，也奠定羅森在商周青銅研究的地位。羅森之外，美國的倪德衛(David Nivison)與他的學生們長期以來一直從事西周銘文、年代與曆譜的研究。商周曆譜研究早期以董作賓的《殷曆譜》(1945 年出版)為代表，之後一直有學者投入相關研究，直到 1996-2000 年中國政府推動「夏商周斷代工程」，使得這門學問成為顯學。由於國家支持與資源挹注，吸引不少中國學者投入曆譜與年代研究。不過中國學界對西周曆日的重視並未加速中美學界的交流，反而使雙方的歧見愈深、對話困難。

近二十多年，臺灣居於商周銅器研究的邊緣——既在中國邊緣、也在美國邊緣，但整體來說還是比較接近中國些，對中國的研究成果較為熟悉。本文旨在引介 1990 年代以後西方學界對西周銅器與銘文之代表性研究，並對現行的金文年代研究方法作一檢討，最後思考如何有效利用銅器與金文材料，擴展研究面向。

不小，相關的跨文化思考，參見 Paul Taylor ed, *Iconography without Texts*.

<sup>5</sup> 貝格立近來在解釋某些裝飾母題的使用時，曾嘗試從感知系統(perceptual system)的角度作思考，參見 Robert Bagley, "Interpreting Prehistoric Designs," pp. 43-68; 至於貝格立對高本漢與雷德侯的批評，參見 Robert Bagley, *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pp. 17-48, 113-120.

## 二、西周禮器制度的研究回顧

學者早已注意到西周中晚期青銅禮器的風格有明顯變化，但由於早期資料有限，加上這個改變被視為頹敗與沒落的表現，故未引起學界深論。<sup>6</sup>至於周代禮制，考古學者根據墓葬出土訊息，提出不同看法。最早是郭寶鈞(1893-1971)以「列鼎」稱呼形制、紋飾相同的成套銅鼎或陶鼎，認為這些成套的鼎即是文獻所載的升牲之鼎——「升鼎」，並稱墓葬中出土的大鼎為「鑊鼎」。<sup>7</sup>鄒衡(1927-2005)與徐自強在整理郭寶鈞遺作《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時，更試圖從西周時期的歷史發展來解釋這套禮器制度，他們認為「從禮器制度來看，真正的周禮大概是從穆王時代才開始的。」這套禮器制度的出現不是表示統治秩序穩固和強盛，而是因為「舊統治秩序已經開始搖搖欲墜了。」<sup>8</sup>

1978年俞偉超(1933-2003)與高明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以《周禮》、《儀禮》、《禮記》三禮制度為準，試圖將考古出土的墓葬材料納入傳世文獻系統。<sup>9</sup>其方法上的問題林澐已有精闢評論，茲不贅述，<sup>10</sup>此處僅論該文章背後假設。俞偉超與高明在分析整理《三禮》制度後，提出「天子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

<sup>6</sup>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頁17-20；Bernhard Karlgren,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p. 116; 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pp. 14-15; Robert W. Bag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onze Art in Later Western Zhou," pp. 239-248.

<sup>7</sup>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頁11-13、42-47。

<sup>8</sup> 郭寶鈞遺著，鄒衡、徐自強整理，《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整理後記〉，頁208-209。

<sup>9</sup>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頁84-98；(中)，頁84-97；(下)，頁83-96。

<sup>10</sup> 林澐，〈周代用鼎制度商榷〉，頁12-23。

或「公、侯七鼎，伯五鼎，子、男三鼎或一鼎」，讚嘆西周早期「未見任何逾制的痕跡，又表明這種制度在當時該是多麼穩定啊！」<sup>11</sup>並以「第一次破壞」、「第二次破壞」、「第三次破壞」稱呼西周晚期以後的發展。換言之，俞、高二人認為西周禮制在立國之初便已確立，之後所有變化都是「禮崩樂壞」的結果。<sup>12</sup>俞偉超、高明認為周代森嚴的等級制度是建立在井田制的經濟基礎之上，懿、孝之時，王位繼承糾紛使得宗法制走向衰亡、井田制破壞，從屬的用鼎制度也發生變化。<sup>13</sup>在俞、高二人的研究中，傳統周公制禮作樂說隱然貫穿全文。雖然此說在十九世紀末便為康有為打破，後來錢穆、郭沫若進一步論說，學界多已接受《周禮》成書於戰國之說，周公是否建立一套井然的禮樂制度大有疑問。<sup>14</sup>

許倬雲也注意到穆王之後出現的墓葬等級制度與傳世文獻相呼應，特別是《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鼎簋制代表封建層級的確立，也反映西周統治手段的演變：從早期的強制性武力到系統化、制度化的禮儀。<sup>15</sup>關於這套禮的實質內涵，許倬雲並沒有進一步討論。有別於俞偉超、高明以為西周立國之初已有一套禮樂制度，許倬雲將鼎簋制度視為西周政權逐步發展、演變的結果。

以上學者在討論西周禮制時，主要著眼於制度面，試圖將三禮所載的身分等級與考古出土情況相對應，提出一套等差的禮器制度。同

<sup>11</sup>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頁 89。

<sup>12</sup> 不少學者仍有此看法，參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頁 283-363。

<sup>13</sup>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頁 84-85；（中），頁 84-85。

<sup>14</sup> 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頁 2191-2300；關於康有為、錢穆、郭沫若、徐復觀等人對周禮的討論評述，參見余英時，〈《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啓示〉，頁 1-27。

<sup>15</sup> 許倬雲，《西周史》，頁 159-164。

時，受到傳世文獻的引導，對青銅禮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種類、數量、大小，而造型與裝飾基本上不在討論之列。羅森在觀察西周銅器的大小、造型、紋飾與組合之後，於 1988 年提出西周禮制革命一說，<sup>16</sup>歷經二十多年，這個看法逐漸發酵，成為西周考古與歷史的重要課題。這個文獻未載的變革對西周禮器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在器類上，商代以來的酒器全面退場，食器簋、鬲、盃、簠取而代之；在組合上，器形、紋飾相同，大小相序的列鼎與列簋成為身份的象徵；禮器的體量明顯加大、器表裝飾也從動物紋轉變為波帶、竊曲等幾何紋樣。根據上述形式變化，羅森進一步推論器物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商代以來體積小、花紋精緻的禮器適合近距離使用；西周中期以後體積龐大、裝飾粗獷的銅器則適合遠觀，加上列鼎、列簋的陳列性，都說明禮儀朝向視覺性與公開化發展。羅森推測此時的祭祀、典禮，除了核心參與者，應有一群觀禮者，在周圍觀看著禮儀的進行。

禮制革命具體發生於何時？根據 1976 年陝西扶風莊白窖藏出土的微史家族歷代銅器來看，癸一代是關鍵。<sup>17</sup>李學勤從牆盤銘文止於穆王，並參酌相關青銅器銘文，推測牆活動的時間應為共王至孝王，牆之子癸則為孝王至夷王，時間為公元前九世紀初。<sup>18</sup>羅森接受這個

<sup>16</sup> Jessica Rawson, "A Bronze-Casting R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and Its Impact on Provincial Industries," pp. 228-238;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pp. 71-95;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93-125.

<sup>17</sup> 該窖藏出土了一百多件青銅器，分屬微史家族不同世代，原來可能是宗廟中的祭祀禮器。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頁 1-18。關於窖藏與墓葬文物之不同，參見 Jessica Rawson, "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 the Evidence from Tombs and Hoards of the Shang (c. 1500-1050 BC) and Western Zhou (c. 1050-771 BC) Periods," pp. 805-823.

<sup>18</sup>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頁 29-36。

訂年，將禮制革命的時間訂在公元前 880 年左右。<sup>19</sup>

美國學者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同意羅森的看法，但使用較為溫和的字眼：禮制「改革」(reform)取代「革命」(revolution)。另外，他對變革發生的時間也有所異見，他從晚期癸器上飾有波帶紋推斷，癸活動的時間下限可以晚到西周晚期，故而將癸的年代下限訂在厲王。<sup>20</sup>羅泰引倪德衛對西周曆法的研究，認為共王之後出現兩套曆法，並行時間長達半世紀，可能代表王室的分裂；<sup>21</sup>同時又接受倪德衛王室內部分裂為二的說法，並大膽推測史牆屬於孝王陣營，因此牆盤刻意不記載敵對的懿王與夷王。如此一來，牆的時間從懿王到夷王都有可能。羅泰引倪德衛二王並立之說明顯是為了將癸往下拉到厲王，但倪說並無直接佐證。撇開倪的二王並立說不談，也的確有些學者根據曆日將部分癸器訂到厲王，顯示學界對癸的活動時間尚有爭議。<sup>22</sup>

稍晚於羅森，中國學者曹瑋分析出土青銅器，提出西周前期大體繼承商晚期之發展，至共、懿前後出現突變，包括新類型食器出現、

<sup>19</sup> Jessica Rawson, "A Bronze-Casting R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and Its Impact on Provincial Industries," pp. 228-238;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pp. 71-95;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93-125.

<sup>20</sup>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pp. 181-184, 208-209; 羅泰，〈有關西周晚期禮制改革及莊白微氏青銅器年代的新假設：從世系銘文說起〉，頁 651-676；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pp. 29-73.

<sup>21</sup> David S. Nivison, "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 pp. 481-580; "Western Chou History Reconstructed from Bronze Inscriptions," pp. 44-55.

<sup>22</sup> 朱鳳瀚將四年癸壺、十三年癸壺都列為厲王，但後者未排入年曆表，參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冊，頁 1221-1224；彭裕商以為除癸壺外，其他癸器大致是厲王時器，參見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頁 403-406；夏商周斷代工程以 13 年癸壺為厲王器，參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頁 33。

既有器類形制轉變、列器的出現、編鐘制度形成。無獨有偶地，他也注意到這些變化僅反映在考古材料，文獻沒有記載。<sup>23</sup>最近黃銘崇大規模整理完整未受盜擾的西周墓葬，也採用羅森的觀點，以「禮制改革墓」稱呼恭王以後鼎簋組合的墓葬。<sup>24</sup>

由於缺乏文字記錄(無論傳世文獻或出土文字)，在美國的中國學者李峰採取較保守的立場，他不同意使用禮制改革或革命這類詞語。他認為西周中期以後禮制的變化是漸進的，不過是貴族社會政治制度變化的一環。他最大的質疑是：如果真有這樣的改革，為何完全不見於出土文獻？<sup>25</sup>從個別禮器來看，李峰的漸進說有其道理，西周新興的食器的確是逐漸出現的，商式酒器也是逐漸消亡的。不過西周中、晚期晉國、芮國、虢國貴族墓地中都出現了一致性很高的鼎簋制度與明器系統，這新的組合似乎說明了制度層面的改變，它統一規範了新型禮器的組合與使用。革命一詞或有過當，但的確可見明顯變革，羅森最近也改用羅泰的 *Ritual Reform* 一詞。<sup>26</sup>

羅森的禮制變革論提出後對學界有何影響？鼎簋食器取代觚爵酒器，學界亦有觀察，紋飾變化也非其創見，<sup>27</sup>她的洞見主要在統合這些變化，並指出西周中期以後禮器與禮儀朝向公開性、陳列性的發展。近年許多西方研究者均從公開、陳列的角度重新解釋西周材料。

<sup>23</sup> 曹瑋，〈從青銅器的演化試論西周前後期之交的禮制變化〉，頁 443-456。

<sup>24</sup> 黃銘崇，〈從考古現象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頁 607-670；(下)，頁 1-82。

<sup>25</sup> Li Feng, "The Study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A Response and A Methodological Explanation," pp. 287-306.

<sup>26</sup> Jessica Rawson,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 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ca. 1000-650 BC," pp. 35-36.

<sup>27</sup> 如陳芳妹亦早有類似觀察，〈商周青銅簋形器研究——附論簋與其他盛器的關係〉，頁 56-64；陳芳妹，〈商周青銅酒器析論〉，頁 48-50。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分析《詩經》中與禮儀相關的篇章，指出〈周頌〉中部分成於西周早期的篇章為典禮中吟唱的詩歌，關係緊密的貴族群體在典禮中共同慶祝周初文武建國。到穆王時，不僅〈有瞽〉文末「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直述西周貴族以「觀看」的方式參與典禮，此時西周開國君王或當代英雄也成為宗廟樂歌吟詠的對象，應是為了典禮表演之需。<sup>28</sup>夏含夷對於觀看性、表演性的關注正與羅森所論相合。<sup>29</sup>美國學界的柯馬丁(Martin Kern)也從展演(performance)角度分析《詩經》，將〈楚茨〉與禮儀過程繫連以探討其性質，<sup>30</sup>並論及西周文字的視覺表現、性質與功能。<sup>31</sup>類似討論也見於李峰對西周中晚期銅器銘文內容的分析，此時青銅禮器以其加大的體量、醒目的裝飾與多樣的銘文內容成為家族光榮的紀念物、社會事務的載體，在西周貴族的人際網絡中，發揮重要的宗教、政治與社會功能。<sup>32</sup>

### 三、西周諸王年代與銅器斷代問題

近二十年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是年代與曆譜研究，課題雖老，但因 1996-2000 年之「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斷代工程」)而成為顯學。「斷代工程」結束已逾十年，今日比較可以客觀地評判其成果。

<sup>28</sup> “It was probably not long before they moved from singing about the rituals to the ancestors to singing about the deeds of the ancestors themselves.” 參見 Edward L. Shaughnessy, “Western Zhou History,” p. 333.

<sup>29</sup> Edward L. Shaughnessy, “Western Zhou History,” pp. 323-351.

<sup>30</sup> Martin Kern, “*Shi Jing* Songs as Performance Texts: A Case Study of “Chu Ci” (Thorny Caltrop),” pp. 49-111.

<sup>31</sup> Martin Kern, “The Performance of Writing in Western Zhou China,” pp. 109-175.

<sup>32</sup> Li Feng,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Contexts of Writing in the Western Zhou,” pp. 271-301.

「斷代工程」的目標之一，是利用傳世文獻與銅器銘文重建西周共和(841 BCE)以前諸王年代，各家學者無不卯足全力編排西周曆譜。目前所見西周曆譜有二十多家，無一相同。<sup>33</sup>在實際操作上，有全以銅器銘文重建曆譜者，也有根據某一種西周曆譜(早期多參考吳其昌、新城新藏、董作賓之西周曆譜，後來則根據張培瑜依實際合朔時日編訂之《中國先秦史曆表》)，<sup>34</sup>訂立出數個年代上的支點以為標尺，再排入王年、月、月相、干支俱全的金文。<sup>35</sup>此外，也有利用科學、天文學方法來訂年，包括用碳 14 測定考古出土有機材質以判斷墓葬年代、利用天文週期推算傳世文獻記載的重大天文現象。「斷代工程」在科學與天文學方面的成果最為突出，但遭受的批評也最多。以碳 14 測年來說，過去碳 14 測定的年代誤差動輒超過百年，「斷代工程」大幅降低誤差範圍至五十年內，使碳 14 發揮訂年的指導作用。然而「斷代工程」使用的「擬合」方法與 68% 的低置信度，均受到科學專家嚴厲批評。<sup>36</sup>至於天文學方法則被用來推算「斷代工程」中重要的年代支點，如：古本《竹書紀年》所載「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董作賓解釋「天再旦」指的是發生在日出之際的日食，造成鄭地出現二次日出，並推算此天文異象發生於公元前 966 年，韓國學者方善柱則推算為公元前 899 年。<sup>37</sup>

33 關於西周諸王年代諸說總整理，參見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頁 432-433。關於西周金文斷代各家方法之評析，參見杜勇、沈長雲，《金文斷代方法探微》。

34 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前言〉也簡要評述已出版的類似工具書。

35 「夏商周斷代工程」整理出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青銅器 55 件，以七個支點為標準排定曆譜。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頁 18-36。關於西周曆譜操作方法之討論，參見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頁 412-424。

36 蔣祖棣，〈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摘要)——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頁 1-4。

37 參見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頁 424-425。

「斷代工程」推算此現象發生於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並指出這是公元前 1000-840 年在鄭地唯一可以觀察到的一次日出之際的日食。<sup>38</sup>不過天文研究者指出，日食有固定週期，推算出的年代不確定性高，對此結果尚有疑慮。<sup>39</sup>此外，「斷代工程」在天文學方法的操作與結論上，和方善柱與美國學者班大維(David W. Pankenier)雷同，<sup>40</sup>但「斷代工程」簡本並未引用兩人的研究成果，引發美國學界對「斷代工程」違反學術倫理的強烈批評。<sup>41</sup>

本文主旨雖不在對「斷代工程」進行總檢討，但銅器與金文的年代是研究之本，有必要了解各家曆譜不一甚至對立的原因。以下集中討論金文訂年的幾個關鍵。

首先，學者們對「月相」詞語的見解差異很大，即使是王年、月份、月相、干支俱全的金文，年代也不一定有共識。<sup>42</sup>「月相」指的是「初吉」、「既生霸」、「既死霸」、「既望」，這四個詞語經常出現在王年、月份之後，指的是月亮週期性的圓缺變化。但這些月相詞語實際對應到一個月當中的什麼時間，歷來說法不一，基本上可分為「定點說」與「四分說」兩種。定點說始自漢代劉歆，認為每個月

<sup>38</sup>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頁 18-36。

<sup>39</sup> 用天文現象斷年的批評，包括方法上的缺失與當中之不確定性，參見 Douglas J. Keenan, "Astro-Historiographic Chronologies of Early China Are Unfounded," pp. 61-68.

<sup>40</sup> 班大維之研究，參見 David W.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p. 2-37.

<sup>41</sup> 對於「工程」十年後之回顧，參見夏含夷，〈「夏商周斷代工程」十年後之批判——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

<sup>42</sup> 關於月相語詞各種說法之檢討，參見杜勇、沈長雲，《金文斷代方法探微》，頁 167-290。

相代表一個月當中固定的日子；<sup>43</sup>王國維提出「四分月相說」，認為每一月相詞語代表一個月亮週期中的特定區段。<sup>44</sup>無論採取「定點說」或「四分說」，各家對個別月相詞語涵蓋的時日區段也有不同見解。

另外，也有學者提出「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為月相用語，與月亮週期有關，「初吉」則否，它與「既吉」一詞同屬吉日系統。<sup>45</sup>接受此「吉日說」的研究者對於初吉出現的時間，也有不同的看法：黃盛璋認為初吉出現在初一到初十；<sup>46</sup>馮時認為吉日在曆日中沒有固定位置；<sup>47</sup>李學勤與徐鳳先認為在月初；<sup>48</sup>也有認為初吉為朔日、朏日者。<sup>49</sup>

提倡吉日說的學者對金文進行統計，發現「初吉」出現的日干很不平均，丁日特別多，子日一例也沒有。干支相配則以丁亥最多，佔全部初吉日的三分之一強，這有別於其他月相語詞，干支出現的頻率相對平均。<sup>50</sup>這個統計加強了「初吉」為吉日、而非月相之說法。如果進一步分析吉日說的統計資料，會發現丁日特別多的情況主要出現

43 關於定點說的最新應用，參劉啟益，《西周紀年》。

44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1冊，〈生霸死霸考〉，頁19-26。

45 黃盛璋，〈釋初吉〉，頁71-86；劉雨，〈金文初吉辨析〉，頁76-84；馮時，〈晉侯蘇鐘與西周曆法〉，頁407-441；李學勤，〈由蔡侯墓青銅器看「初吉」和「吉日」〉，頁85-88；Xu Fengxian (徐鳳先)，"Using Sequential Relations of Day-Dates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Scope of Western Zhou Lunar Phase Terms," pp. 171-198.

46 黃盛璋，〈釋初吉〉，頁71-86。

47 馮時，〈晉侯蘇鐘與西周曆法〉，頁407-441。

48 李學勤，〈由蔡侯墓青銅器看「初吉」和「吉日」〉，頁85-88；Xu Fengxian, "Using Sequential Relations of Day-Dates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Scope of Western Zhou Lunar Phase Terms," p. 198.

49 參黃盛璋之討論「初吉非朔非朏辨」，〈釋初吉〉，頁83-84。

50 黃盛璋，〈釋初吉〉，頁81-83；劉雨，〈金文初吉辨析〉，頁78；馮時，〈晉侯蘇鐘與西周曆法〉，頁427。

在東周時期。下表 1 針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收錄的一萬四千多筆金文資料進行初步統計：

表 1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收錄初吉語詞統計

| 初吉語詞          | 西周    | 東周    | 總數    |
|---------------|-------|-------|-------|
| 初吉            | 230   | 266   | 496   |
| 初吉丁亥          | 46    | 165   | 211   |
| 正月初吉丁亥        | 14    | 147   | 161   |
| 初吉丁亥 / 初吉     | 20%   | 62%   | 43%   |
| 正月初吉丁亥 / 初吉   | 6.1%  | 55.3% | 32.5% |
| 正月初吉丁亥 / 初吉丁亥 | 30.4% | 89.1% | 76.3% |

資料來源：「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est/bronze/qry\\_bronze.php](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est/bronze/qry_bronze.php)，查詢時間：2013 年 1 月 29 日。

「初吉丁亥」佔「初吉」比例從西周的 20% 增加到東周的 62%；「正月初吉丁亥」的增加更劇，佔「初吉」的比例從西周的 6.1% 增加到東周的 55.3%，在整個東周的「初吉丁亥」中也達 89.1%。由此可見，丁亥在西周初吉中還不特別突出，到了東周才佔絕對多數，甚至可能成為吉祥套語。這個初步的統計顯示，初吉意義之討論，無論是月相說或吉日說，都必須要考慮時代因素，或許不是單一意義貫穿兩周。

月相詞語是曆譜的基本要素，解釋不同，金文年代自然無法取得共識，<sup>51</sup>西周諸王積年也就眾說紛紜，<sup>52</sup>其中以昭穆至共和間的周王爭議最大。此階段雖是文獻所載最闕略的時期，卻是王年、月份、月

<sup>51</sup> 關於西周銅器年代諸說整理，參見張懋鎔，〈試論西周青銅器演變的非均衡性問題〉，頁 344-352，附表。

<sup>52</sup> 關於西周諸王年代諸說總整理，參見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頁 432-433。

相、干支俱全之金文數量最多的階段，理論上，金文應可大大補充傳世文獻之不足。《史記》對此時期的記載十分隱晦，只說「共王崩，子懿王躋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sup>53</sup>此時王室內部發生繼承危機，共王傳子懿王，懿王死後卻由王叔孝王即位，孝王之後，王位又回到懿王之子夷王。關於這個不尋常的王位繼承，倪德衛認為共王之後，王室分裂為懿王、孝王兩個陣營，因此出現兩套曆法並行的情況。倪氏的說法，除了他所排定的曆日資料之外，並無直接佐證。<sup>54</sup>張聞玉甚至重排周王世系為共、孝、懿，取代原來的共、懿、孝；<sup>55</sup>不過這個看法在 2003 年陝西眉縣楊家村逯盤出土後已不可行，因為逯盤銘文明列共、懿、孝、夷連續四王世系。

無論各家曆譜如何調整，總有不少銅器無法排進曆譜。根據統計，目前王年、月份、月相、干支俱全的銅器有六十多件，在不改動金文曆日的情況下，合譜之金文從 20 至 48 件不等。<sup>56</sup>為何有這麼多器無法排進曆譜？最常見的解釋是金文曆日記載可能有誤、或西周曆法施行細節(如：建正、置閏、大小月等)不明，倪德衛則提出周王雙元年之說。倪德衛的商周年代研究相當倚重一直以來被視為偽書的《今本竹書紀年》，他認為這本書後幾卷雖為偽造，但當中紀錄的王年基本可信，並復原了文字在竹簡上的布排與內容。<sup>57</sup>他在建立西周曆譜的過程中發現，有些按內容當屬於同一王世之金文卻無法排入同一王之曆

<sup>53</sup>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卷 4，頁 140-141。

<sup>54</sup> David S. Nivison, "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 pp. 481-580; "Western Chou History Reconstructed from Bronze Inscriptions," pp. 44-55.

<sup>55</sup> 張聞玉，〈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頁 335-338。

<sup>56</sup> 杜勇、沈長雲，《金文斷代方法探微》，頁 253-254。

<sup>57</sup> 倪德衛，《竹書紀年解謎》。

譜，同時這些器推算出來的王元年經常相差 2。結合《公羊傳》文公九年「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的記載，倪氏提出雙元年說，一為實際繼位之逾年，另一為服喪三年期滿後正式稱王之元年。<sup>58</sup>倪氏之法擴大了金文年曆合譜的可能，將 56 件干支俱全的青銅器排進曆譜，是目前合譜金文最多的方法；而他對《今本竹書紀年》的重視與雙元年說，後來又得到夏含夷進一步闡發與應用。

西周金文年代眾說並陳，是否可能檢證各家曆譜的有效性？2003 年陝西眉縣楊家村單氏家族窖藏出土了四十二年與四十三年逯鼎，由於同出的逯盤銘文列舉了西周諸王，自文、武王以下至於厲王，因此逯器銘文作於宣王，各家均無疑義。這兩件銅器應可用來核校各家之宣王曆譜，換句話說，無法將這兩件器排入曆譜者，其曆譜可能需要調整。然而，若按照公認的宣王元年(公元前 827 年)來推算，竟沒有一家曆譜可以排入這兩件器。夏含夷以公元前 825 年為元年，於是將這兩件器排了進去，<sup>59</sup>這似乎印證了倪德衛與夏含夷提倡了二十多年的周王雙元年之說。目前看來，此「雙元年說」基本上為美國漢學界所接受，羅泰、李峰近年著作都採用了夏含夷按此原則推算出來的西周年表。<sup>60</sup>在中國的學者質疑雙元年說沒有文獻基礎、又帶有任意性，<sup>61</sup>基本上不相信、也不採用這個看法。在美國與在中國的研究者各執一說，尚無對話。

<sup>58</sup> David S. Nivison, "The Key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Three Dynasties: The 'Modern Text' *Bamboo Annals*," pp. 1-68; "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 pp. 524-535.

<sup>59</sup> 夏含夷，〈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兩件吳逯鼎的年代〉，頁 49-52。

<sup>60</sup> 有關夏含夷的年表，參見 Edward L.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pp. 147-155, 236-287;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p. 59; Li Feng,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p. xv.

<sup>61</sup> 參見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頁 424。

西周年代研究也存在方法上的缺失，最致命者當屬循環論證的問題。在重建周王曆譜時，各家均依賴六十多件王年、月份、月相、干支俱全的銅器銘文，但這些銅器屬於哪個王世並非不證自明，有些器所屬的王世爭議很大。在實際操作時，這些器的年代經常隨著研究者的月相解釋、曆譜需要而游移於不同王世。為解決此問題，徐鳳先分析數個月相術語同時並見的銘文，根據銘文的內在邏輯推估「初吉」、「既生霸」、「既死霸」的時間，試圖建立可靠的月相基礎。雖然例證不多，但徐鳳先的研究方法具有突破性，值得進一步發展。<sup>62</sup>「斷代工程」則是將青銅器器形、花紋獨立出來，單獨進行斷代研究，作為金文定年之參考。<sup>63</sup>但王的積年長短不一，從數年至數十年不等，而銅器風格大約五十年可見明顯改變，<sup>64</sup>青銅器風格的變化顯然與王世更迭不同步，要將個別器形、花紋明確訂到某王世有其困難。另外，銅器風格的發展隨著不同地區、群體可能有差異，如陳芳妹觀察到不同的裝飾母題流行於不同地域；<sup>65</sup>張懋鎔提出在西周早、中期，商人製器保留了較多商晚期的作風，顯得較為保守。<sup>66</sup>由此可知，同一時期的銅器受到宗教、政治、社會等因素影響，呈現不同的風格面貌。

62 Xu Fengxian, "Using Sequential Relations of Day-Dates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Scope of Western Zhou Lunar Phase Terms," pp. 171-198.

63 如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之一的張長壽、陳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

64 如林巳奈夫分西周銅器為早、中、晚期三期，三期之下又細分早晚兩段；李峰也分陝西西周青銅禮器為六期，每期大約五十年。參見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李峰，〈黃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銅禮器的分期與年代〉，頁 383-419。

65 陳芳妹，〈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西周青銅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及禮制發展大勢變因試析〉，頁 99-181。

66 張懋鎔，〈西周青銅器斷代兩系說芻議〉，頁 1-26；〈試論西周青銅器演變的非均衡性問題〉，頁 344-352。



除了前述方法與技術性細節之外，金文的根本性質也有待釐清。整個西周年代研究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金文是忠實的紀錄。但金文中的時日，是否確為真實記錄？<sup>67</sup>王國維早已指出「古人鑄器，多用丁亥」，<sup>68</sup>黃盛璋評述王國維此一觀察時也說「鑄器多選正月初吉丁亥，其日未必實有，猶漢鏡多用五月丙午，按之實際，多不和」。<sup>69</sup>除此之外，年代學研究者多半將銅器與所載金文視為一體，忽略了金文中的日曆是「所載事件」發生的時間，而非銅器鑄造之時。

松丸道雄指出銘文、造型、紋飾相同，看似同組之器物不一定製作於同時、同地。他討論作冊鬯尊、作冊鬯卣這兩件器，雖然造型、花紋相稱、銘文相應，但兩器銘文語氣截然不同，鬯卣中鬯均為他稱，而鬯尊中鬯自稱為「余」，可見兩者不是同時、同地之作。從銘文內容之差異，松丸進一步推測有些青銅器可能是在諸侯的作坊中製造。另外，出土於陝西武功縣北坡村的師賁簋蓋也屬此類例子。這兩件簋蓋看似同時之作，但仔細比較銘文後，可以發現兩篇銘文除字體風格不同外，其中一件的書寫者識字能力可能有限，在描摹時有不少模糊之處，甚至誤把墊片痕跡當作「口」。<sup>70</sup>松丸表示，銘文相同看似同時鑄造的成組銅器，實際鑄造時間與製作背景可能有差異。李峰也應用此方法討論河北房山琉璃河 M1193 出土的克盃、克盃，分析二器的銘文與器形特點，認為這兩件器雖屬同一人，但鑄造時間有別，克盃為西周初期燕侯始封時所作，克盃則成於燕侯晚年的成康之時。<sup>71</sup>

<sup>67</sup>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pp. 175-176.

<sup>68</sup>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3冊，〈齊國差鑄跋〉，頁897。

<sup>69</sup> 黃盛璋，〈釋初吉〉，頁80。

<sup>70</sup> 松丸道雄，〈西周青銅器製作の背景〉，頁11-136。（中譯本頁261-324）

<sup>71</sup> Li Feng, "Ancient Reproductions and Calligraphic Variations: Studies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with Identical Inscriptions," pp. 1-41. 除了同銘器的討論，李

松丸與李峰的研究顯示，青銅器與所載銘文應分別看待，一則銘文撰成之後可能在不同場合、因應不同需求重覆鑄造至青銅器上，而有一銘多器的情況。這些器可能為同時，也可能為不同時間所鑄，無論如何，金文所載事件在時間上永遠早於銅器之鑄造。此外，有些器銘記錄了一個家族不同時期的事件，如有名的史牆盤、逯盤、大克鼎，這突顯出金文是一種紀念、記事性的文類，內容帶有強烈的追憶性質。近來中國學者也呼應這個觀點，如：李朝遠在討論西周金文中的「王」與「王器」時，便將金文視為一種追憶性的紀念文字，並認為「長由盃」提到的穆王、「十五年趙曹鼎」提到的恭王均為死諡，而非傳統認定之時王生稱。<sup>72</sup>從同時羅列先王與時王的「史牆盤」、「逯盤」銘文來看，兩者對過去先王均稱全名，對時王則稱「天子」或單稱「王」，李朝遠的推斷是有道理的。究竟銅器中的王名為生稱、死諡、還是兩者都有，應再全面審視。

以上關於曆譜基礎與金文性質的思考，不僅質疑所謂「標準器」的年代，也動搖年代學研究的根本。「斷代工程」在 2000 年結束，但年代研究的基本假設與方法上的問題仍待解決。

#### 四、二十一世紀的新材料與新課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除禮制改革與金文年代研究繼續發展外，從金文內容出發的政治、制度、法律等研究也有突破。李峰結合金文、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出版了兩本書，一從西周與其周邊的消長探討西

---

峰也繼續發揮松丸道雄的諸侯作坊觀點，參見 Li Feng, "Literacy Crossing Cultural Borders: Evidence from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pp. 210-242.

<sup>72</sup> 李朝遠，〈西周金文中的「王」與「王器」〉，頁 74-79。

周的滅亡，另一探討西周官僚系統與政治的關聯。<sup>73</sup>西周金文研究也有幾項新發展：首先，金文被當作一種特定的文類來研究，考察其特殊性及其政治、社會、禮儀功能，如柯馬丁(Martin Kern)所編《早期中國的文本與禮儀》(*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集中討論早期文本的禮儀脈絡；<sup>74</sup>李峰與林德威(David Prager Branner)編輯的《早期中國的書寫與識字能力》(*Writing & Literacy in Early China*)，則進一步析論書寫所反映各時、各地識字情形，當中不少文章涉及西周金文及其使用脈絡。<sup>75</sup>

銅器研究方面，公元二千年後，無論在材料、研究課題均有開展。1990年代前，西周研究的主要材料除了陝西出土的眾多窖藏之外，另有西周早中期大型墓葬有河北房山琉璃河燕國墓地、陝西寶雞強國墓地、陝西長安張家坡墓地、陝西涇陽高家堡墓地等，西周中晚期大型墓葬除虢國墓地外，相當缺乏。近二十年西周中晚期貴族墓地陸續發現，提供研究新材料，已發表者包括：1986-2007年發掘的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sup>76</sup>1990年代發掘的山西天馬——曲村北趙晉侯墓地，<sup>77</sup>最近的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sup>78</sup>與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sup>79</sup>另外

<sup>73</sup> Li Feng, *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sup>74</sup> Martin Ker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up>75</sup>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Royal Audience and Its Reflections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 pp. 239-270; Li Feng,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Contexts of Writing in the Western Zhou," pp. 271-301.

<sup>76</sup> 正式報告陸續出版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應國墓地 I》。

<sup>77</sup> 正式報告尚未出版，部分出土品見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山西晉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

<sup>78</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發掘簡報〉，頁 4-14、26。

<sup>79</sup>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19 發掘簡報〉，頁 3-14；〈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27 發掘簡報〉，頁 3-21；〈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26 發掘簡報〉，頁 4-21；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梁帶村芮國墓

還有西周早期墓地與墓葬，如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sup>80</sup>陝西寶雞石嘴頭西周貴族墓、<sup>81</sup>以及山西南部發現的絳縣橫水虢國、黎城楷國、翼城大河口霸國墓地。<sup>82</sup>其中應國、晉國、芮國等墓地的墓葬規模弘大、墓主身分等級高、隨葬品豐富、經常是夫妻異穴合葬，而且跨越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研究者可以從長時段來研究諸侯的陪葬禮制、各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以及諸侯國間的關係等課題。隨著材料陸續公佈，未來研究可期，以下僅討論銅器相關的新研究。

在這方面，臺灣研究社群雖小，但因對中國新出土材料的掌握迅速，又與歐美學界互動頻繁，出現一些開創性的研究。陳昭容仔細分析新出土銅器及其銘文，釐清周邊民族與周人的通婚情形，並思考漢字出現在中原周邊時的可能意義。陳昭容此一系列研究深具啟發，特別是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兩周時期漢字在不同地區的流布，惟是否以「華夏化」來解釋，可再考慮。<sup>83</sup>黃銘崇大規模整理完整未受盜擾的西周墓葬，結合銅器銘文，細緻區分西周青銅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並以文獻所載的「分器」來解釋西周早期墓中出現的商器。

---

地：2007 年度發掘報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金玉華年——陝西韓城出土周代芮國文物珍品》。

<sup>80</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 M65 發掘簡報〉，頁 3-40；〈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頁 4-60；〈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頁 31-52。

<sup>81</sup> 石鼓山考古隊，〈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發掘簡報〉，頁 4-54；〈陝西省寶雞市石鼓山西周墓〉，頁 3-24。

<sup>82</sup> 這幾個墓地僅有簡報，討論參張天恩，〈晉南已發現的西周國族初析〉，頁 50-56；考古報告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頁 16-2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掘簡報〉，頁 4-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頁 9-18。

<sup>83</sup> 陳昭容，〈從青銅器銘文看兩周夷狄華夏的融合〉，頁 329-362；陳昭容、林農堯，〈漢字何時過長江？〉，頁 33-57。

雖然討論的是傳統的禮制課題，但在研究方法有所創新：結合銅器銘文，有系統地區分不同族群的禮器制度。<sup>84</sup>

美術史研究方面，2002年陳芳妹以晉侯墓地為中心，研究女性墓葬中特有的青銅三足甕與雙耳罐，追溯它們的北方來源，指出這些與姬晉貴族通婚的北方女子對新器類與新風格之貢獻。<sup>85</sup>陳芳妹首次將性別議題引介到商周青銅文化研究，具體說明晉文化與北方的連結，擴大器物討論的面向，也加深研究的複雜度。一直以來也相當關注文化互動議題的羅森，則從源自印度的紅瑪瑙珠出發，討論西周早、中、晚期各諸侯國與北方地帶(Northern Zone)的互動交流。各諸侯國中，晉國、秦國與北方的互動最密切，虢國與應國則相對保守。<sup>86</sup>至於互動的形式與規模，羅森認為可能不僅於貴族通婚，而是「不同人群、習俗的普遍交融」。<sup>87</sup>羅森此文使用大量考古資料，對紅瑪瑙珠的觀察也頗為細膩，例如：她觀察到不少珠子的邊角有缺損，推測它們可能受到珍視而被特意保留。不過由於文章涵蓋範圍太廣、牽涉的器物種類繁多、現象複雜，有些所謂的北方因素並沒有得到充分討論。此外，羅森在結論指出禮制改革將外來因素轉化成周文化的一部份，然而這個內化(assimilation)的過程也尚待進一步研究。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公元二千年後關於商周銅器復古的研究。羅森討論西周禮制改革時，已經發現商晚期、西周早期銅禮器特點再次出現，她稱之為有意的復古(conscious archaism)，包括西周早期方座簋的

<sup>84</sup> 黃錦崇，〈從考古現象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頁 607-670；(下)，頁 1-82。

<sup>85</sup> 陳芳妹，〈晉侯墓地青銅器所見性別研究的新線索〉，頁 157-196。

<sup>86</sup> Jessica Rawson,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 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ca. 1000-650 BC," pp. 1-42.

<sup>87</sup> Jessica Rawson,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 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ca. 1000-650 BC," p. 14.

再流行、與商觥造型相似的匜之出現並且取代盃、還有以成套器物表達身份的作法。<sup>88</sup>這個意見提出時並沒有受到重視，一直到公元二千年後，隨著學界對復古、仿古議題的關注，近來才有進一步討論。<sup>89</sup>西周銅器當中以微形銅器首先受到注意，這些銅器體積減小、製作粗糙、不具實用功能(因此被視為明器)，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多以已消亡的商代酒器為範本。為何製作這些明器？羅森以為西周中、晚期的貴族以商式酒器連結家族祖先與光榮，以此強調家族的古老源流。<sup>90</sup>除了過去風格的復興之外，西周貴族墓中有時出現商代、甚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器物，其原因與意義也待研究。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學科開始發展，百年來累積大量考古資料，文化的年代序列逐漸建立，各時期器物的風格特點也趨於明朗。在此基礎之上，本世紀的研究者才有條件進行仿古、復古風格的討論。這個議題才剛開展，相關現象包括早期紋飾、造型的再興、工匠如何模倣過去、<sup>91</sup>商周貴族對過去文物的收集、改製、再利用與背後心態等，均值得有系統地整理資料，進行討論。

---

<sup>88</sup>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107.

<sup>89</sup> 參見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頁 23-31；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pp. 9-46; Jessica Rawson, "Reviving Ancient Ornament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Examples from Shang and Zhou Bronze Vessels," pp. 47-76;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Antiquarianism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and Its Significance," pp. 77-102.

<sup>90</sup> Jessica Rawson, "Novelties in Antiquarian Revival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pp. 1-34; "Reviving Ancient Ornament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Examples from Shang and Zhou Bronze Vessels," pp. 47-76.

<sup>91</sup> 東周侯馬陶範當中有些仿自商代紋飾，參見 Robert W. Bagley, "Debris from the Houma Foundry," pp. 50-58.

## 五、結語

本文以商周紋飾的意義之爭作為前一階段的結束、現階段的開始。近二十多年，西方學界當中學科的對話增加，包括藝術史、考古學、歷史學、金文年代學等。這樣的發展可謂「跨學科」嗎？實際上，在分工日趨細緻的學術環境中，一個研究者幾乎不可能精通各學科方法與研究，因此，所謂「跨學科」指的主要是研究的視野與角度。換句話說，各學科研究者本於所長，就同一議題之不同面向進行對話、相互啓發、提出檢討。西周中、晚期禮器改革是這個發展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基於器物風格之觀察，羅森提出了這個看法，其他的研究者從金文、傳世文獻觀察到社會、禮儀之變化，特別是儀式性、表演性的發展。然而改革說也不是所有學者都接受，有的認為這些變化僅是「轉變」尚稱不上有意識的「改革」。

相較於禮制改革說具有跨學科性質，近二十年的研究顯學——金文年代研究體現了學術的分工專業性。坦白說，年代與曆譜學者各自有一套假說，結果是各家自成系統，當中幾乎沒有建立共識的可能。由於數十家曆譜彼此沒有交集，讓我們必須反思年代研究的方法基礎與金文性質。這個批判的目的不在推翻金文年代之研究，而是在自我提醒：身為研究者，必須對材料抱持批判態度，並不時審視長久以來習以為常的假設。

最後，1990年代以來大量西周貴族墓地的發現，提供了研究新材料，也已累積不少成果。在銅器方面，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早期流行的文化交流課題再次受到學界重視。在二十一世紀，基於材料細緻的分析與比較，學者跳出百年前傳播論的框架，具體釐清互動交流中的人、審視西周文化中的外來因素。北方民族對於春秋以下物質文化

的衝擊與交互影響業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西周時期的討論相對較少。草原民族與黃河流域定居民族彼此相鄰，卻有著不同的物質文化傳統，對於草原文化的進一步認識，也必將加深學界對黃河流域傳統的了解。至於復古、仿古研究對中國青銅時代來說是個全新課題，此課題之出現有賴二十世紀學術成果之累積。崇尚古代至少在東周便成為中國文化一個鮮明的特點，<sup>92</sup>商周藝術的復古、仿古現象也值得未來深入探討。

(本文於 2012 年 7 月 26 日收稿；2013 年 5 月 23 日通過刊登)

\*本文從初稿到定稿，中間經過大幅修改，在此特別感謝兩位  
審查人詳細閱讀本文，並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

<sup>92</sup> Dieter Kuhn,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pp. 17-68.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二、近人論著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山西晉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7(北京，2011)，頁 9-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09：1(北京，2009)，頁 4-14、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7(北京，2006)，頁 16-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8(北京，2006)，頁 4-18。

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

石鼓山考古隊，〈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13：2(北京，2013)，頁 4-54。

石鼓山考古隊，〈陝西省寶雞市石鼓山西周墓〉，《考古與文物》，2013：1(西安，2013)，頁 3-24。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余英時，〈《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啓示〉，《新史學》，1：3(臺北，1990)，頁 1-27。

李丰(李峰)，〈黃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銅禮器的分期與年代〉，《考古學報》，1988：4(北京，1988)，頁 383-419。

李朝遠，〈西周金文中的「王」與「王器」〉，《文物》，2006：5(北京，2006)，頁 74-79。

- 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5。
- 李學勤，〈由蔡侯墓青銅器看「初吉」和「吉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8：5(北京，1998)，頁 85-88。
-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1(北京，1979)，頁 29-36。
- 杜勇、沈長雲，《金文斷代方法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松丸道雄，〈西周青銅器製作的背景〉，收入氏著，《西周青銅器とその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0，頁 11-136。(中譯本：松丸道雄著，蔡鳳書譯，〈西周青銅器製作的背景〉，收入《日本考古學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東方書店，1990，頁 261-324。)
-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
- 林雲，〈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學集刊》，1990：3(長春，1990)，頁 12-23。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應國墓地 I》，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
-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中)、(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1(北京，1978)，頁 84-98；1978：2，頁 84-97；1979：1，頁 83-96。
- 倪德衛，《竹書紀年解謎》，永和：Airiti Press，2009。
- 夏含夷，〈「夏商周斷代工程」十年後之批判：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臺北：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2012 年 6 月 21 日。
- 夏含夷，〈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兩件吳迷鼎的年代〉，《中國歷史文物》，2003：5(北京，2003)，頁 49-52。
-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958]。
-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1978：3(北京，1978)，頁 1-18。
- 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梁帶村芮國墓地——2007 年度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19 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7：2(西安，2007)，頁 3-14。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26 發掘簡報〉，《文物》，2008：1(北京，2008)，頁 4-21。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27 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7：6(西安，2007)，頁 3-21。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金玉華年——陝西韓城出土周代芮國文物珍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 張天恩，〈晉南已發現的西周國族初析〉，《考古與文物》，2010：1(西安，2010)，頁 50-56。
- 張長壽、陳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濟南：齊魯書社，1987。
- 張聞玉，〈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原收在《西周王年論稿》，又收入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頁 335-338。
- 張懋鎔，〈西周青銅器斷代兩系說芻議〉，《考古學報》，2005：1(北京，2005)，頁 1-26。
- 張懋鎔，〈試論西周青銅器演變的非均衡性問題〉，《考古學報》，2008：3(北京，2008)，頁 337-352。
- 曹璋，〈從青銅器的演化試論西周前後期之交的禮制變化〉，《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 443-456。
-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郭寶鈞遺著，鄒衡、徐自強整理，《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陳芳妹，〈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西周青銅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及禮制發展大勢變因試析〉，收錄於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 99-181。
- 陳芳妹，〈晉侯墓地青銅器所見性別研究的新線索〉，收入《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頁 157-196。
- 陳芳妹，〈商周青銅容器研究的課題與方法〉，收入《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959-990。
- 陳芳妹，〈商周青銅酒器析論〉，收入《商周青銅酒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 11-60。
- 陳芳妹，〈商周青銅簋形器研究——附論簋與其他簠盛器的關係〉，收入《商周青銅簠盛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頁 19-110。
- 陳昭容，〈從青銅器銘文看兩周夷狄華夏的融合〉，收入《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2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329-362。

- 陳昭容、林農堯，〈漢字何時過長江？〉，收入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主編，《2010數位典藏地理資訊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2010，頁 33-57。
-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7(北京，2012)，頁 31-52。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 M65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1：3(武漢，2011)，頁 3-40。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11(北京，2011)，頁 4-60。
- 馮時，〈晉侯穌鐘與西周曆法〉，《考古學報》，1997：4(北京，1997)，頁 407-442。
- 黃盛璋，〈釋初吉〉，《歷史研究》，1958：4(北京，1958)，頁 71-86。
- 黃銘崇，〈「饗饗紋」的再思考——一個方法的省思〉，《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2 期(臺北，2012)，頁 1-102。
- 黃銘崇，〈從考古現象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臺北，2012)，頁 607-670；84：1(臺北，2013)，頁 1-82。
- 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劉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11(北京，1982)，頁 76-84。
- 劉啟益，《西周紀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
- 蔣祖棣，〈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摘要)——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漢學研究通訊》，21：4(臺北，2002)，頁 1-4。
- 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燕京學報》，11(北平，1932)，頁 2191-2300。
- 羅泰，〈有關西周晚期禮制改革及莊白微氏青銅器年代的新假設——從世系銘文說起〉，收入《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頁 651-676。
- Bagley, Robert W. "Debris from the Houma Foundry," *Oriental Art* (October 1996), pp. 50-58.
- Bagley, Robert W.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onze Art in Later Western Zhou," in Wen Fa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p. 239-248.
- Bagley, Robert. "Interpreting Prehistoric Designs," in Paul Taylor ed., *Iconography without*

- Texts*.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2008, pp. 43-68.
- Bagley, Robert. *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2008.
- Karlgren, Bernhard.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8 (1936), pp. 9-156.
- Keenan, Douglas J. "Astro-Historiographic Chronologies of Early China Are Unfounded," *East Asian History*, 23 (2002), pp. 61-68.
- Kern, Martin. "Shi Jing Songs as Performance Texts: A Case Study of 'Chu Ci' (Thorny Caltrop)," *Early China*, 25 (2000), pp. 49-111.
- Kern, Martin, 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 Kern, Martin. "The Performance of Writing in Western Zhou China," in S. La Porta and D. Shulman eds., *The Poetics of Gramma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Sound and Sign*. Leiden: Brill, 2007, pp. 109-175.
- Kuhn, Dieter.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eds.,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pp. 17-68.
- Li Feng. "Ancient Reproductions and Calligraphic Variations: Studies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with Identical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22 (1997), pp. 1-41.
- Li Feng.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Contexts of Writing in the Western Zhou," in Li Feng and David P. Branner eds., *Writing &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p. 271-301.
- Li Feng. "Literacy Crossing Cultural Borders: Evidence from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4 (2002), pp. 210-242.
- Li Feng. "The Study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A Response and A Methodological Explanation," *Early China*, 33-34 (2010-2011), pp. 287-306.
- Li Feng.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Li Feng. *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i Feng and David P. Branner, eds. *Writing &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 Early China Semina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 Loehr, Max.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New York: Asia House Gallery, 1968.
- Nivison, David S. "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2 (1983), pp. 481-580.
- Nivison, David S. "The Key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Three Dynasties: The 'Modern Text' *Bamboo Annals*," *Sino-Platonic Papers*, 93 (Jan. 1999), pp. 1-68.
- Nivison, David S. "Western Chou History Reconstructed from Bronze Inscriptions." in George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3, pp. 44-55.
- Pankenier, David W. "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Early China*, 7 (1981-1982), pp. 2-37.
- Rawson, Jessica. "A Bronze-Casting R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and Its Impact on Provincial Industries," in Robert Maddin ed.,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8, pp. 228-238.
- Rawson, Jessica. "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 the Evidence from Tombs and Hoards of the Shang (c. 1500-1050 BC) and Western Zhou (c. 1050-771 BC) Periods," *Antiquity*, 67:257 (1993), pp. 805-823.
- Rawson, Jessica.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 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ca. 1000-650 BC," in Mayke Wagner and Wang Wei eds., *Archäologie in China, vol. 1, Bridging Eurasia*. Mainz: von Zabern, 2010, pp. 1-42.
- Rawson, Jessica. "Novelties in Antiquarian Revival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故宮學術季刊》, 22: 1(臺北, 2004), 頁 1-34。
- Rawson, Jessica. "Reviving Ancient Ornament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Examples from Shang and Zhou Bronze Vessels," in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s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Sympo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47-76.
- Rawson, Jessica.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 75 (1989), pp. 71-95.
- Rawson, Jessica.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0.

- Shaughnessy, Edward L. "Western Zhou History,"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92-351.
- Shaughnessy, Edward L.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Taylor, Paul, ed. *Iconography without Texts*.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2008.
- von Falkenhausen, Lothar. "Antiquarianism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Sympo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77-102.
- von Falkenhausen, Lothar. "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18 (1993), pp. 139-226.
- von Falkenhausen, Lothar. "The Royal Audience and Its Reflections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 in Li Feng and David P. Branner eds., *Writing &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p. 239-270.
- von Falkenhausen, Lothar.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 Whitfield, Roderick, 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3.
-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 Xu Fengxian. "Using Sequential Relations of Day-Dates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Scope of Western Zhou Lunar Phase Terms," *Early China*, 33-34 (2010-11), pp. 171-198.

### 三、網路資源

-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est/bronze/qry\\_bronze.php](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est/bronze/qry_bronze.php)，擷取時間：2013年1月29日。

## **A Critical Review of Studies 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and Inscriptions, from 1990 to the Present**

**Ya-huei Hs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critical review examines studies 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 vessel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published after 1990. This period started with the “Western Zhou Ritual Revolution,” first proposed by Jessica Rawson in 1988 to explain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the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Many scholars have followed Rawson’s emphasis on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mid- to late Western Zhou ritu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eriod has featured the government-sponsored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from 1996 to 2000. One of its goals was to decide the reigning years for each Western Zhou king; yet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fter 2000, many remarkable Western Zhou cemeteries and tombs have been discovered, bringing about new avenues of research. In this review,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adopte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ill receive special attention.

**Keywords:** ritual reform, ritual revolution,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calendrical calculation